

流通方式的改變和影響值得研究者們進一步探討。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重新回到了錢進仁的故事上，分析錢獲得文人青睞的深層原因。作者認為，雖然錢死後葬入虎丘，表面上獲得所謂的文人身份，但是當時的文人卻絕沒有把他當成文人圈子的一員，他們甚至因為自己與他的交往而感到羞耻，為他撰寫行狀的王縉僅僅見過這位補鞋匠一次，且未有任何交談。然而，一方面明末王陽明心學的出現帶來儒家思想的內轉傾向，文人開始重視內心的意念以及日常化的實踐，加上佛家對眾生平等的倡導，促成了他們對錢進仁的同情。另一方面，聯繫到前面五章所陳述的文人獲得書籍的各種困難，他們在得到書籍和知識過程中遭遇的挫折、焦慮和緊張感，我們便不難理解作者在全書結尾所下的結論：藏書並沒有讓補鞋匠成為菁英中的一員，但他對書籍的感情卻牽動了菁英們的心；文人學者們欣賞的是錢進仁對於書籍那種單純的、非功利的熱愛，他對殘破版本的珍惜喚起了他們在追求書本和知識並成為菁英的道路上種種痛苦的體驗和記憶。因此，當地的文化菁英把錢進仁樹立為典範式的人物，但他們很清楚，這是他們自己的塑造之功，而絕非錢本人的成功。在這裡，再一次凸顯出書籍在菁英文化中的中心位置。

本書最大的價值並不限於探討書籍本身，而是為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即把技術、行為和觀念聯繫起來，置於社會學的分析框架中，探討其背後的經濟和政治成因。另外，對於慣於與古籍打交道的研究者來說，本書也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思考：今天所見古代文獻在當時的流傳程度有多廣？他什麼時候才正式被刊刻？在之前的傳抄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當時人為什麼會形成某種特定的閱讀趣味？他們通過什麼方法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相信閱讀本書之後，無論是東方抑或西方的學者都會對這些精美絕倫的中國書籍產生更全面、更深刻的一層認識。

黎恩

中山大學中文系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By CHRISTOPHER A. REED.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xvii, 391pp.**

今天到上海去的學者們都會去一趟福州路——一個從前被稱為文化街的地方。這裡是上海最大的書肆集中地，見證了當代中國出版行業的繁榮盛

況。在《上海的古騰堡：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1876—1937》一書中，俄亥俄州大學的歷史學家黎倜甫（Christopher A. Reed）研究了19世紀晚期到1937年日本統治開始這一時期中國印刷業資本主義在這個地區的興起和發展。該書融合了科技社會史、商業史、書籍與印刷文化史的取向，來分析在近代中國印刷文化與印刷商業之背景下的印刷資本主義，是一部跨學科研究的範例。

這部著作使用了非常豐富的中文和外文原始材料，包括有大量的檔案資料、報刊雜誌以及與印刷工廠老雇員的訪談材料。藉此，黎倜甫向我們展現了中國傳統木板印刷向西方機器印刷的轉變，如何以各種方式成為了中國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一部份；這個轉變創造了新的學術印刷出版文化，引介了商業組織的新形式。許多關於中國的民族國家進程的學術著作其實都對19世紀早期中國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有所涉及，但是此書是第一部以印刷資本主義為主題的著作；並且以上海為中心。而上海在20世紀前期就已經成為了中國印刷產業和文化的中心地，領引學術討論和技術發展的潮流。

書中以五章展開分析，按照時間順序討論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議題。第一章詳細介紹和分析了1807—1930年，工業化的印刷技術如何被引進中國。印刷媒介、印刷廠和印刷機器主要由英國和美國傳進，帶來了技術轉變。新的技術一開始是在澳門、香港、廣州、上海以及其他通商口岸落腳，那裡的傳教士因為傳教和辦學的原因引進和發展了印刷機器。不過，傳教士並非促進印刷技術長期發展的要素。到了1870年代，中國開始對西方技術表現出興趣。一開始是石板印刷，接着是凸版印刷，最後完全取代了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工藝。黎倜甫運用詳盡的專業技術知識分析了技術的轉變，並指出「19世紀以來，傳教士帶給中國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轉變，就是用以印刷中文的石版印刷和平板印刷技術的發展」（頁84）。最終，在中國新興的出版印刷行業中，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穩佔鰲頭。

第二章探討上海的石版印刷出版商的技術抱負以及直到1905年傳統科舉考試和教程廢除之前，他們對城市文化生活的影響。正如黎倜甫所指出的，中國的出版商人們之所以精明地選擇石板印刷是因為其低廉的資金投入及精美的印刷效果。作者精彩地講述了在他稱為石板印刷出版的「黃金年代」中，上海最主要的三家石板印刷商——點石齋印書局、同文書局和蜚英館的生意經營和技術發展。到1880年代後期，他們已經發展成為頗具勞力規模的機械化印刷工廠。然而，自1895年以後，他們受到機械凸版印刷廠越來越強大的商業競爭並很快被取代，特別是報紙和雜誌的印刷上。普通的書籍出版

也不例外。

中國印刷工廠機械化的成果，是上百種新的報紙雜誌的出版，他們見證了1895年後新的政治文化。第三章就探討了上海從維修舶來印刷機器到自己製造印刷機器的工業化進程。黎倜甫指出，通過仿照進口機器的方法，中國最後掌握了自己製造印刷機的技術，而上海也在1920年代成為了中國印刷工業的中心。書中討論了賣機器的商店、複雜的印刷工作階序和學徒體制；但更為重要的，作者指出，中國印刷機械產業的成功是民國工業發展的一個特例。在其他的大型工業部門，如紡織工業，本地的工廠就一直未能製造可代替進口機器的設備。

第四章討論的內容是本書的主題，即印刷文化和商業向近代印刷資本主義的轉變。西方印刷技術的高成本推動出版商尋找更多的資本來源。同時，為了保障在技術方面的資金投入和市場利益的分配，1905年成立了書商同業工會，1905—1906年和1911年都有貿易協會成立。資金投入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合股。與公司企業在其他行業興起的情況相似，印刷業儘管採用了西方的公司企業模式，但是仍然維持前工業化時期的印刷商業文化所形成的傳統的商業思維和實踐。這個結論也更加證實了近期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中國20世紀早期的近代商業企業融合了西方的公司形式和傳統中國商業的實踐架構這一論點。

最後一章介紹了在1912—1937年間統治上海新式圖書市場和出版生意的三個「新式書籍印刷資本家」（new-style book-publishing print capitalists）（頁204）的個案。在1916年左右開始興盛起來的上海文化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以及世界書局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通過講述這三家出版機構各自不同的資本組合形式、負責人，他們之間的激烈競爭和市場策略，黎倜甫把在民國時期動蕩的政治環境下，印刷出版行業的日常商業活動講述得引人入勝。1912—1927年，由於統治當局的軟弱無力，三家出版機構在出版教科書的問題上鬥得你死我活，1928年通過蔣介石政府的介入才得以解決。但是，由於政府規管教科書的印刷出版，政治事件還是會繼續地影響這些出版商們。

《上海的古騰堡》一書內容豐富，論點獨到，讀來饒有趣味。書中探討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但同時關注技術發展的社會史，以及近代中國印刷出版企業的商業史。黎倜甫重點研究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而非印刷商業和印刷文化，指出「工業化是中國印刷資本主義興起的物質基礎」（頁9），填補了現有研究的空白。除了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技術基礎，作者亦對於經濟條

件給予了恰當的關注，比如可以向現代銀行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籌得資金，印刷生意中出現新形式的商業和管理組織，以及民國時期新的商業網絡和不斷變化的政治資助，等等。黎涸甫重申20世紀早期上海知識分子對於期刊，特別是教科書和參考書的重大影響；同時，他亦論證了，儘管有各種的技術革新，傳統印刷商業文化的思維方式不僅繼續存在，而且還在整個20世紀上半段都主導了出版公司的商業決定。最後，必須要指出的是，作為一部討論書籍與印刷出版的著作，《上海的古騰堡》是一部編輯嚴謹的精美力作。我們期望在出版業持續發展的洪流中，會有更多的書籍在內容智識和裝幀精美方面達到如此高的水準。

柯麗莎（Elisabeth Köll）

美國凱西大學歷史學系

【黎麗娜譯 歐冬紅校】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465頁。

莊子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是之故，儘管楊念群的這本新著涉及了諸如「身體理論」、「生命權力」以及「空間政治」之類令人極富聯想的話題，但是由於該書的經驗內容乃是對中國近代醫療變遷問題的社會史分析，這就使我們有理由將之解讀為一項比較純粹的社會史研究。尤其是在像筆者這樣僅具些社會史常識的人看來，該書問題意識中最容易理解且最具價值的部份，應該是其對目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某些主流傾向提出了頗具建設性的反思。

根據作者本人的說明，他有感於當代的許多歷史學家越來越不會講故事，認為「本該是講故事的場所放眼望去充斥着被現代觀念肢解過的所謂『歷史』的殘肢斷臂」，從而在本書中採取了一種「情境化寫作」方式。這樣一來，儘管作者在導言和結論部份中對全書的整體構架和內在邏輯有所闡明，但是或許出於對學術著作通行結構的抗拒，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將自己關於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方法論關懷，隱藏在了對歷史場景的深描之後。不過，只要細心體察一下作者銜接歷史場景的手法及其勘別事件序列的坐標，不難發現該書所展現的社會演化脈絡，恰恰針對着當前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某些主流傾向面臨的困境，而其根據近代醫療變遷的實踐所發展出的